

北大中文文库

金开诚文选

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学科与论点的发明也是联系与反联系。如文艺心理学便是由文艺学与心理学联系而成，但不是把二者原封不动联系起来，而是先要经过反联系，把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提取出来，才能化合成一种新的学问。

金开诚 著 / 《金开诚文选》编辑组 编选



金开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金开诚文选

金开诚 著 / 《金开诚文选》编辑组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开诚文选/金开诚著;《金开诚文选》编辑组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301-17746-4

I. ①金… II. ①金…②金… III. ①金开诚-文集②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5041 号

书 名: 金开诚文选

著作责任者: 金开诚 著 《金开诚文选》编辑组 编选

特 约 编 辑: 马庆洲

封 面 设 计: 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7746-4/I · 225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274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

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言

仰望国学鸿儒的星空，总能看到北大中文系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在那些熠熠生辉的伟名之中，有我们深深景仰的老师金开诚先生。

先生一生博研深思，著述宏富；学以致用，襟抱天下，是当代著名学者、著名民主人士，享有传统文化学家、古典文献学家、文艺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等诸多桂冠头衔。而在北大中文系授业弟子的心目中，先生首先是“师”，是睿智通透、传道解惑、潜心思考、圣手治学的大师。

一

先生自 1955 年毕业留校至 1994 年调任九三学社中央，四十年间一直坚守在北大中文系教学第一线，先后在文学、新闻和古典文献等三个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讲过的课总计有十余种，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先秦文学史”、“文学通史”、“新闻写作”、“基础写作”、“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文艺心理学”、“中华传统文化概论”、“书法艺术研究”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享誉甚隆的经典课程。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讲课风格，总结创制并勉力传播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为莘莘学子指引着求学、论道、成就人生的路径与阶梯。

先生授课，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先生的课常常都是百人以上的大课，除本系学生外，历史系、哲学系、图书馆系甚至外校的师生也慕名前来。尤其是“文艺心理学”、“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等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听的人就更多了。最初安排的教室往往过于拥挤，开课后经常不得不换到办讲座用的大型阶梯教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

室设备简陋,很少有扩音器材,所以凡上大课,学生们总是争相到前排就座,否则就有听不清楚之虞。但听先生的课,则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人以为先生天生底气足、嗓门大,其实他是竭尽全力在“喊话”。两节课下来,先生常常累得全身乏力,声音嘶哑,往往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但再上课时,他依然精神抖擞、声如钟磬。

先生的课堂境界独具,更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无论是易于迸发才情的文艺心理学、楚辞、写作等课程,还是内容较为枯燥的“文学要籍介绍”、“历史要籍介绍”,先生都能在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情趣,把听课者全副身心牢牢吸引到讲台上,几至如醉如痴的地步。不知不觉两节课的时间过去了,学生们常常还沉浸在先生营造的课堂氛围中,不忍离去。

先生的学生胡友鸣(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副主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金老师讲课神采飞扬,讲得气象高远,内容深厚,幽默隽永,充满智慧,充满机趣,充满激情,洋溢着对社会对民族的诚挚感情和对生活的深厚热爱。课上课下,我们丝毫没有听到甚至感到当时所谓‘中年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那种对各种条件的抱怨。反过来说,许多课从概念上看,谁都可以讲,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者也能讲,但绝对讲不出金老师的气度和神韵。金老师的课,更着重于人的培养和塑造。凡涉及人品、气节的都浓墨重彩,强调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

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先生认为,讲课必须要听的人觉得清楚、精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这效果的取得,其实是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教师把课讲好当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究竟有效与否,那就还要看学生接受得怎样,因此必须把讲授与接受统一起来考虑。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是否接受并理解了呢?先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重与学生眼神相接。他认为,讲课如果只知一味地照本宣科读讲稿,是很难讲出精彩效果的,必须时时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当有的学生流露出茫然、疑惑的眼神时,就说明他没有听懂,或者没听进去,或者是自己没讲清楚,要么就

是讲得不够精彩、不吸引人,这就需要修正自己的讲法。与此相关,先生讲课极富节奏感,常常在学生听得疲倦时来一两个笑料或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先生的课,讲得极其清楚,所谓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且相当深入。这种讲课,看上去举重若轻,其实处处艰辛。看他的讲义,不仅字迹清晰秀丽,而且往往是天头地脚补满了种种“插曲”和“典故”,所谓口才好会讲课,其实是用心用力备课。

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学生们渐渐地体会到了一种学风。北大也许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流俗的学术风气,人多注意到这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和开放,但也应当留意这里也有严谨和规范。

先生授课讲学的这些“绝活儿”,既来自于他过人的禀赋与勤奋,也源自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认为,给学生讲课必须处处为学生着想,树立一种服务意识,只有服务到心才算是服务到家。而要服务到心,必须心中深怀着对青年同学的善意与爱心,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师生间在思想情感上的距离。感情融洽了,说话才能投机,彼此越说越爱听。

除了授课之外,先生所传授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也使学生们受益无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身为老师大抵都会教学生一些读书学习的方法,但很少有人能像先生那样,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把一系列朴素而尖端的学习方法概括得那么生动传神、易懂易记。

“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凡是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对这三句话无不耳熟能详,铭刻在心。

“看为基础”。具体说就是好学不倦,不断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并能在学习前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看”包括很多方面,仅就其中“看书”这一点来说,也需要掌握方法。先生认为正确的看书法应该是“发酵式看书法”,就是说看一本书除了掌握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之外,还要边看边想,在书的内容的启发下,产生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想为主导”。先生认为,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全面运用思考、记忆、想象、联想等各种才能,在学到的知识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课题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忆。只有坚持以想为主导的脑力劳动,学习才会深入,知识才会有用,也才可能有所创造。

“落实到用”。先生认为,治学不能务虚,“看”过、“想”过之后,一定要落实到写。对于有志于学习语言文学的人来说,“用”主要是指“写”。“写”不仅是“看”和“想”的继续,而且能使思维的成果深刻化、条理化。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问题好像已经想透了,等到写出来一看,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在写作上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是不容易把思维成果准确深刻地表现出来的。先生曾说,古文献专业的人读文献,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不过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献勒出脉络理出头绪,而最终还是要把它写成文字,否则读书满腹却两手空空。他很不赞成所谓“五十岁后再写文章”的老教条,倒总是鼓励学生把想法写出来。在先生的鼓励下,古文献专业一些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成了中华书局著名刊物《文史知识》最年轻新锐的作者。

这三句格言式的精辟归纳,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其核心就是鼓励治学的人把学习和创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要“趁热打铁”,边学习边创造,以创造促学习,使学业在这“边学习边创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提升。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但知识怎样才能成为力量?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白。所以先生特别强调知识的运用,提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的观点。先生认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生,在大学里花上若干年时间,学习了不同的学科,并不等于他就可以掌握这些不同的学科;看了很多本书,并不等于他就掌握了这些书。知识是否被学习者吸收并使用,要看其学习是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学生在学校里就要树立学以致用的观念,而到了工作中,“用”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纸上得来终觉浅,以用为主,在用的过程中,缺什么知识就赶紧去学,学了就用,就是把知识变为自己的最快手段。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其内在的潜力就会被“逼”出来,学习能力会极大地释放出来,大脑高度集中,搜集应对当前

困境所必需的信息,随即转化为操作的能力,这就叫“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体味先生提出的“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和“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等治学思想,不难发现,先生对“学以致用”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为了进一步阐释如何“用”并强调“用”的功效,他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学习法。

什么是“建立根据地”学习法?先生说:“所谓‘建立根据地’,是指在多变的工作中要力争在每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果,有个立足之地,这些成果虽然分散在各个学术领域,最后却可能连成一片。”在治学实践中一定要注重创造成果。每读一本书,每学习一点什么,都要做出一点成果,把一个个小的成果连接起来,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先生告诫后辈学人:千万不要学做“两脚书橱”,书读了不少,却只能用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真要干活却无真才实学。

先生概括的学习方法还有很多,如强调勇于开拓、善于积累、不断充实的“滚雪球法”等等。

先生关于教学与治学的思考和实践,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后辈教师和青年学子,有些“金氏箴言”,甚至成为令他们受益终生的座右铭。在无数聆听过先生谆谆教诲的学子那里,先生当之无愧地享有最受敬重师长的礼遇。

二

先生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领域的重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楚辞全面深入的研究上。先生研治楚辞,是从1959年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工作开始的。

在协助游国恩先生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过程中,为了收集《九歌》注疏资料,他把当时查阅到的大约一百五十种相关古人撰著逐一检读辨析,并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条附入《九歌》各句之下。《九歌》资料收集完毕之后,为了对游国恩先生的《离骚》长编初稿进行补充和校勘,他再度对这一百五十种著作进行了细密的翻检与研读。对于这项

工程浩大、功德无量的楚辞研究工作,先生勤恳有加、不吝付出,却从不居功。在《楚辞注疏长编》第一部《离骚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二部《天问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后,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要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转引自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引用的先生致周氏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持并推动着先生的楚辞研究,对海量学术资料的深入梳理,更使先生精思的心灵多所融摄,拥有了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先生的楚辞研究因而进一步立论足据,杜绝空言,不断收获丰硕喜人的果实。在《楚辞注疏长编》之外,先后出版了《楚辞选注》、《屈原集校注》(与董洪利、高路明合著)、《屈原选集》(与高路明共同选注)、《独领风骚两千年——屈原》(与刘东葵合著)等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一系列注释性著作,并推出了系统精详的论著《屈原辞研究》。1986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公推先生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学术委员。

楚辞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对它的解读注释,自是楚辞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金开诚先生的楚辞注释著作,独具特色,汇成系列。先生对诸家注说的谙熟,使他所提供的释义拥有了较高的位势,不乏深入思考、择善而从、多方论证的经典范例。《楚辞选注》的注解,是建立于对众说参比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虽仅十万余字,却具有坚实的学术含量,正如周建忠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所评:“这本选注实际上是金开诚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周氏在将古今选本、注本40余种作过比较、对勘,特别是对当代近20种普及本进行比照分析之后,认为“特别利于初读的《楚辞》入门书,以金开诚此书为宜”。《楚辞选注》注释简洁明确,“平和、具体、实在”,有题说,有注音,有通译,体例周全,颇便读者,“此书一出,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历久不衰”。

相比于早期的《楚辞选注》,16年之后出版的《屈原集校注》一书

则还原了注者所参凭的资料背景与立说过程,此书在辨析词义时列比众说,训解详明。凡遇歧说,《校注》皆就语义进行辨析,并对异说加以择评。注者对诸说的取从是得当而精准的。此书注释方面较《楚辞选注》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先生楚辞研究的具体进展。作为一部汇集屈原全部作品的详注本,《屈原集校注》呈现出更为厚重的学术价值。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原文文字进行校正,进一步凸显了考信之功。《校注》富于列说,案断妥信,发明亦颇可从,确如该书体例说明所言:“注释力求详备,准确,尽量不留难点。”可以引导读者于文义达到较为精详的理解。

《屈原辞研究》是先生楚辞专题研究成果的荟萃。此书内涵饱满,有关屈原与楚辞各主要层面的论题一一在列,表现了先生对楚辞的全局把握与探究。书中考据虽无处不在却又能远离艰深枯燥的泥沼,使读者读来不但毫不费力,而且饶有兴味。究其原因还是作者穷源求实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能将考据融进深入浅出的论述之中,娓娓而谈,充满情采。长篇伟构来自思想的深富,意趣盎然更表征着感情的丰长。先生对屈原人格之美,对屈赋辞章之美有深入真切的识见、体味与感怀,以这种情感贯注笔端自然境界不同,即使是考据之文也别有生色。

此书内容结构非常完整,逻辑布局相当严密。全书六章,分别对“楚辞”、“屈原”、“屈原辞”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综论,对《离骚》、《九歌》等屈原辞代表作展开了深度的探索研究,并聚焦《天问》错简问题,实施了富有创见的考据工作,全方位展示了先生于楚辞专题研究方面的考证之功和论义之长。

在《关于楚辞》的专章中,论著由表及里地论说“楚辞”的名义、特点,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汉代人对楚辞的认识与研究等内容,提供了全景式的立体化解读。先生在此细致阐释了他对于“楚辞”的全面定义,详尽论述了“楚辞”所包含的诗体、作品、书名等三重含义。在专论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时,涉及汉代人对楚辞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等问题,重点考证了汉初楚辞发掘与传扬的两条线索。

论著总结了两汉时代楚辞研究的得失。特别强调了汉代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对“屈原否定论”的驳诘之功。书中指出,汉代对屈原及其

辞作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确证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及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些辞作；确证了屈原生平事迹的三大要点，并联系这些事迹注释了他的作品；通过传述、评论和注释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并为后世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屈原及其辞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著在肯定汉代楚辞研究宏观成果的同时，也阐明了其在微观领域的失当，指出汉代人常犯将屈原生平事迹三大要点（忠君爱国、放逐、投水自尽）随意申说并曲解具体问题和文句的错误。比如，在《离骚》创作背景的解释上，汉代人就过度“扩散”了“放逐”这个“重点”，造成了不少微观认识上的偏差。此类精到的见解，来自于先生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深入的研究、思考与推理，洞彻恰切，醒人耳目。事实上，思维的严密精细，论义的层涵丰富、转论多端正是贯穿《屈原辞研究》全书的重要特点。

先生在“关于屈原”的章节，细致探讨了屈原的出生时间、屈原与上官大夫之间的斗争背景、屈原遭到疏远流放及自沉于江的始末等重要专题，先生坚持以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在对各家注疏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精彩评说、择善而断，同时紧密结合对屈原作品精细妥帖的考察，深入思考、谨慎论证，力求使屈原的各种事迹最终形成一个较为优化的有序结构。先生高度注重精细求证的过程，所列论项不仅足以证成其说，还往往包含着细节上的精见与文献上的发明。而直击本质的系统认识更展示了从全局的维度把握历史的立意高度。这种立足深厚的旧学根柢，运用崭新的思考方法而展开的研究与论证，是先生楚辞研究的开创性特色，在《屈原辞研究》一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先生于楚辞研究领域用功颇深、多有建树，他对于屈原重要作品的研究，尤其富有创新意义。

举例来说，先生对《离骚》内容结构的把握非常圆整清晰，见解独到。论著首先揭示了贯穿《离骚》全篇的两个“主题旋律”（即屈原深感得不到君主信任之忧和深感孤立无援之忧），然后追踪出两个“主题旋律”在《离骚》三大段（论著采信清人王邦采对《离骚》篇章结构的划分）中的反复变奏，紧扣主线对篇中“叩阍”、“求女”、问卜、降神……诸多问题一一细致辨析，绎精取繁、冰释疑难，厘清了作为屈原辞代表作

的《离骚》“强烈的抒情性与具有内在逻辑的完整形式的统一”的典型特征,帮助读者深度领会《离骚》,并藉此充分地领略屈原执著的情感诉说方式,感受其澎湃激扬的情感力度。由此进路来解读《离骚》,不再让人在繁复中感到纷然无绪,义旨杂沓,而是脉络分明,主题清晓。有感于一些人认识不到《离骚》的美,先生凭借自己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造诣,点明了读懂《离骚》与深入体味《离骚》之美的必然联系,指出只有与理解相结合的感受才能是准确和深刻的。

先生的《九歌》研究独树一帜,其整体创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屈原辞研究·〈九歌〉研究》章节,先生首先对《九歌》的性质、作用、结构、应用场合和屈原与《九歌》的关系逐一进行了考论,而后重点展开了对《九歌》体制与读法的考求。论著指出,前人因为不明《九歌》体制而犯了许多解释上的错误。要搞清《九歌》的读法,先要明确其表演体制。《九歌》,“是巫者在执行职务时所唱的歌词,而且是边唱边舞”。论著认为应牢牢抓住这一基本事实来了解《九歌》,“《九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者(主巫与群巫)执司其事的。这是《九歌》在表演体制上的一个基本之点”。论著明晰了《九歌》中神、巫、人的关系,认为在《九歌》中,主巫代表神,群巫代表世人,祭祀的主办者并不出现在祭祀现场,他们的敬神之心、求福之愿都是通过代表世人的群巫所表述的。“《九歌》只是祭祀中的乐神之歌,它并不反映一般的祭祀过程。”这样就对《九歌》的表演情形作了清晰恰当的揭示。而这种揭示恰是至关重要的。论著指出过去的许多注家总以为《九歌》中含有世俗人士的活动与唱词,再加上把屈原本人的遭遇和情感牵扯进去,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论著把《九歌》所祀对象分成天神、地祇和人鬼三大类,对《九歌》诸篇各不相同的表演体制和读法展开了周详的分析。其对天神五曲中对唱结构的精确划分,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细致入微的《九歌》内容解读之后,论著进一步以系统论的方法对《九歌》更多重要论题进行了探讨。在相关论证中,强调了如下两点认识:第一,《九歌》不是屈原的个人抒情诗,其中屈原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系自然流露,但这不是屈原有意要借《九歌》来诉说自己。而且屈原加工《九歌》时,还未遭遇诬害与挫折,所以《九歌》当中所流露

出来的乃是多方面的进步思想与积极感情,“古往今来都有人把屈原理解为一个只会发牢骚的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第二,关于《九歌》中的情爱内容。天神五曲中没有男女情爱的内容,地祇之曲“无一例外都有谈情说爱的内容”,但那是地祇与地祇的相爱,谈不上神巫之爱、神人之爱,更与屈原毫无关系。论著作出这样的析解,使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厘清,同时还还原了《九歌》“清新优美、得体当行的本来面目”,推翻了有些人加之其上的亵嫫之诬。此外,论著还对《九歌》的戏剧因素作出了精彩陈说。

关于《天问》错简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先生在考据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论著质驳了王逸认为《天问》原本无序的说法,肯定了清人王夫之《天问》有序的见解,并在后文进一步对天问有序论点展开了考论。又认为今本《天问》的面貌多有错乱,错简之说言之成理。前人为求“拨乱反正”,已展开过积极的尝试,清人屈复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在《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章节,先生纠正错简的总体思路是借鉴系统方法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即先在今本《天问》中确定一段内容制作一个模式使原文变得有序,然后再对模式进行模拟,使有序性扩展至全篇。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也借助系统方法的支持,保障了结论的信实合理。

论著在对夏商周史事做了清晰的叙说及位置还原后,对其他内容和总的顺序也作出了说明,阐述了如下观点:一、今本《天问》开端四十四句关于宇宙原始、九天构营、日月晦明等事的提问次序有致,不存在错简的问题。二、关于大地及自然界奇事怪物的提问错入夏朝史事部分,应还原至问天内容之后。三、早于鲧禹治水的几组提问是关于女娲和尧舜之事,这几组内容在今本夏朝史事部分的最后,应按时序提到鲧禹治水之前,关于自然界的提问之后。四、商周史事之后的一大段内容最为难解,论著分别作了析说,但承认有的内容尚未可确论。

论著通过对《天问》错简的调整使辞句各归其位,文篇调顺有序,实现了内容的清晰化,反映出作者思维的精密与学识的深厚。

总体来看,《屈原辞研究》一书论义精到透彻,全面稳妥,清晰晓

畅,富有新义。论著既注重通观全局又注重细节考真,善于条分缕析,论脉十分清晰。扎实细密的考据功夫所在多有,精义纷呈,尤重结构上、整体上的发明。对问题的研究追根溯源,精细深透。在着重以系统方法对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运用文艺心理学理论提升了认识的高度。该书于1992年获得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一等奖,1994年获得北京市社科研究一等奖,堪称先生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代表性作品。

三

和楚辞研究成就交相辉映的,是先生对于文艺心理学的重要贡献。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对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复苏与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初步形成,开山之作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此后几十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艺心理学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缺失甚至中断的状态。先生在“文革”拨乱反正之后,率先重启了文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80年秋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其后即以讲稿为基础,加上陆续写就的论文十余篇,编为《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198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中。该丛书同时收有宗白华、朱光潜、叶朗等著名美学家的著作,作为八十年代初学术文化复苏时代北大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北大出版社从《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原三十种中精选十种编为《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其《编辑前言》说:“《文艺美学丛书》已出书三十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不仅在当时因某种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或因对某个领域的专深研究成为后人涉及该领域时不可或缺的著述,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即使在学术多元化、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对包括先生著作在内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所收之作的准确而中肯的评价。